

I210.96

G275 L



三联评论

主编 吴士余 倪为国

鲁迅六讲

郜元宝 著



A0997357

HAZ47/10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策划人语

十多年前，陈昕先生主持策划了上海三联版的经济文库。经四五年的努力，陆续推出了经济学术系列、经济学译丛系列近百余种，其不少著述至今仍在经济学界产生着影响。列入文库的作者林毅夫、樊纲、胡汝银、潘振民、史晋川、王新奎等均已成为著名学者或学科带头人。新闻媒体曾以“三联经济学派”的美称表示赞赏。姑且不论“学派”之称是否恰当，这毕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种创意。

跨千年之际，笔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岗位，主持上海三联的编务。接盘伊始，便有一个意愿，企求能为繁荣、活

跃中国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。策划《三联评论》拟可视作上海三联出版理念的延续。自然，学术命题已不局限于经济学，将广伸到文、史、哲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，特别是跨学科、跨文化的研究。王元化先生曾对目前知识界、教育界存在的“注重理工科、重实用，而轻文史哲”的倾向表示担忧，后者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。因此，《三联评论》的任务是将学界精英及中青学人的成果推向学界和公众社会。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联同仁的一致支持，为此，我感到欣慰，并充满着信心。

策划《三联评论》的初衷是旨在活跃学术文化。学术的本质意义是科学、是知识。作为学术研究，学术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品格。不否认，任何时代的学术文化都渗透着部分或局部的意识形态成分，意识形态也因不断吸取新的、优秀的学术思想而显示其活力，但学术文化毕竟不是泛义的意识形态，它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。《三联评论》丛书所追求的，是学术的原创性和多样化，鼓励有思想的学术，有学术价值的学理知识，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，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秩序下，倡导学术文化的自由。这也是我们确定丛书基调的出发点与归宿。

鼓励有思想的学术，不仅仅是指学术理念、学术伦理价值和学术文化构建，还包括认识论、方法论的创新。我们不准备在词章考据、文字训诂的传统学术方面开拓出版疆域，而是注重提升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建设性张力，注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。因此，收入《三联评论》的著述，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，也可以是边缘性的学术探索；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学术文化并存，国学与西学互补；既欢迎某一领域的学理创新，也欢迎多元文化话语对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乃至文学、美学的讨论；学术思维方法不拘泥统一，实证的、微观的、宏观的，兼收并蓄。但有一点是强调的，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应作为出版价值判断的依据。

学术著作出版的创意，还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尝试。我们将《三联评论》限定在8万到10万字的学术著述。相对皇皇宏论而言，它们只是“微型学术著作”。这是希冀学者将某一命题研究的精华熬成一书，在简约的著述中凸显其学术思想的含金量。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矫正90年代以来盛行学界的空疏、矫情之风，重树“理精而义明”的务实学风，以匡正文化消费主义、商业世俗化侵蚀学术而导致的浮夸与焦躁。求短、求精、求新，将是《三联评论》这一品牌的定格。现收入丛书的，既有学界名流的精品，又有新进学人的力作。正是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划人的意图得以实施。

编辑《三联评论》将一以贯之三联的出版传统。这就是三联创始人韬奋先生所提倡的，“文化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”。我们将把《三联评论》视作学术新人的一块园地，即使有的著述还不够成熟，但只要有一点建树和突破，我们都表示欢迎。同时，学术研究作为科学知识，有着自身的价值基准和游戏规则，对一家之言，也将持宽容、尊重的态度。有位学界朋友说得好，“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，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。”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耕耘和建设，应该是开放性的、

前瞻性的，决不能抱残守缺、拘泥传统，自然也不提倡抛弃传统。构建多元的、适应全球化的中国学术文化体系，将世界意识渗入到学术研究中去，应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态势。这也是《三联评论》努力的方向和应尽的责任。

王元化先生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的采访时，对学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希望：“学界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，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”，“要沉潜于自己的专业，为迎接新世纪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，拿出真东西来”。我和上海三联的同仁将以先生的希望自勉，执着、努力，为社会多出版一些优秀的学术著述。

吴士余

2000年6月于上海

Contents

- . Finding a Heart for the Cosmos
-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“Xin” in Lu Xun's Writings
- . The Heart of Imagination and the Heart of Scholarship
- . The Birth of a Heart and the Emergence of Words
- The way of Language: Identity and Difference

- . The F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after the Emergence of Words
——From Fiction to “Zawen”
- . “Free” Thinking and Thinking “Freely”
——Lu Xun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
- . Against “Being Represented”
——Autonomous-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China

自序

“鲁迅六讲”者，杂取旧文新篇，依彦和、横渠语粗加条贯，略示其系统性耳。

初当属稿，有感焉谬托师承、妄想独霸者聒噪无休，遂于一切张扬之高调，自恋之热狂，汰洗惟恐不净；辞落枯槁，意归萧瑟，则非所计矣。

呜呼！造化为英雄变色，更为庸俗设计。世无鲁迅，天下太平，世有鲁迅，天下亦太平，——惟“研究”蜂起，不可以已也。

是亦不可以已者之一种。论文之篇，多袭陈言，间以己说，余则任意而谈，无所依傍，然也不免乎闭门造车，

出不合辙，荆天棘地，道尽途穷。孰首肯之，孰腾笑之，又岂足萦怀。

2000年4月18日晨记

目 录

语言之路：同一与差异	
三 心生而言立	
文学与学术的分途	
二 神思之心和学之心	
鲁迅著作所见 心 字通论	
为天地立心	
自序	1
	1
	45
	75

—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达

六反抗 被描写

—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

五自由的 思想与自由 地 思想

—从小说到杂文

四 言立而文明

105

165

195

一 『为天地立心』

——鲁迅著作所见『心』字通论

“卓者先生，遗荣崇实，开拓新流，
恢弘文术，诲人不倦，惟精惟一。”

——《且介亭杂文·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》

1. “心学”与“文学”的开始

鲁迅著作中“心”字的用法，《科学史教篇》为一转折，此前偶见，皆沿袭旧惯，泛指人心而无特殊规定，如“异哉！王何心乎？”（《斯巴达之魂》）“抚心愁叹……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”（《中国地质略论》），
“笃守旧说，得新见无所动其心”（《人之历

史》)，或为科学上专有名词如“地心”（《中国地质略论》）、“求心力”、“离心力”、“心房”（《人之历史》），——至是篇，始明确赋予文化根基及个体生命自觉二义，并进一步将“心”区分为“神思”与“学”两端：“盖神思一端，虽古之胜今，非无前例，而学则构思验定，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”。不仅如此，“科学发见，常受超科学之力，易语以释之，亦可谓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……盖事业者，成于手，亦赖以心者也”，也就是说，“神思”之心比“学”之心更重要，“学”或“学”的延长即“手”，“非本祇而特葩叶耳”，其“深无底极”的“根源”与“本”，则是“神思”之心，或曰“理想”、“圣觉”。鲁迅抱怨对欧洲近世文明，“举国惟枝叶之求，而无一二士寻其本”，《科学史教篇》，即所以寻科学之本也。这以后，鲁迅干脆用“心”字专指“神思”之心，而于“学”之心废弃不讲，直呼曰“学”、“学说”。

随着鲁迅对“心”的理解逐渐明朗化，短暂的科学时代结束了，“心学”时代揭幕。时在1907至1908年间。

“心”既分为“神思”之心和“学”之心，和“科学”一同让位的，还有“学说”。《科学史教篇》对一切“学”的价值的贬低，已如上述。稍后，《摩罗诗力说》更以“冰之喻”形象说明文学与“学说”功能之不同。他说，要告诉生活

在热带的人冰是什么，种种“学说”的解释都间接而无力，惟把冰块直接贴在热带人脸上，才是最好的解释。文学对人生的描绘，即与此相似。鲁迅用这个比喻说明，“与人生即会”、“直语其事实法则”、“实利离尽，究理弗存”的文学，价值不仅高于“科学”，也高于“学说”。“心学”时代的揭幕，是文学家鲁迅告别科学家鲁迅之始，也为日后文学家鲁迅告别学者鲁迅埋下了伏笔。

鲁迅的“心学”和他的“文学”一同开始，“心学”就是“文学”。作为文化根基与个体生命自觉，有别于科学与学说的神思之“心”的“心声”、“内曜”，在鲁迅看来，就是源初的文学（诗）。

20世纪中国文学又称“新文学”，以别于传统旧文学，这原本不成问题。但各人有各人之所谓“新”，把鲁迅归入“新文学”，固可彰显其个性（相对于形形色色的“旧”），也能淹没其个性（混同于人人皆有的“新”），故不能停留于“新”，应撩开“新”的面纱，“籀读其心声，以相度神思之所在”。在鲁迅，“新文学”首先乃是“心文学”。“心”是本体，“新”则系本体一现象。“新”而无“心”，只剩一副空壳。“新文学”须植根于新的“心”，而非别的什么“新”。判断何为真正的“新”，只能用“心”衡量，不能反过来用“新”衡量“心”。这是鲁迅一生文学\思想最吃紧处。

一般认为，鲁迅早期思想核心在“立人”，这又大致包含相互支持的两面：“掇物质而张灵明，任个人而排众数”。然而，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破恶声论》三篇大文，基本概念都非“人”，而是“心”；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还有“自心”、“自性”、“我性”、“此我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神气”、“本原”、“本根”、“根柢”、“精神生活”、“内部之生活（主观之内面生活）”、“仁义之途，是非之端”、“神明”、“神思”、“人心（近世人心）”、“神思新宗（新神思宗）”、“反观诸己（内省诸己）”、“性灵”、“理想”、“情意”、“情操”、“情感”、“主观”、“主观性”、“主观倾向”、“主观意力”、“内”、“渊思冥想”、“自省抒情”、“内曜”、“自有之主观世界”、“心灵”、“神”、“旨

趣”、“大本”、“灵明”、“灵府”、“中心”、“初”、“所宅”……这些概念极其庞杂，有《周易》、老庄语，孔子、孟子、陆、王语，《文心雕龙》语，佛家语，以及意译西哲语，汗漫无际，但如果抓住基本概念“心”，其立论逻辑还是有序可寻

首先，凡所议论，皆集矢于“轻才小慧之徒”所表现的“近世人心”之“危”，并非单纯从学理上绍述中国传统心性之学所言之“心”（虽然沿用了它的术语），亦非单纯译介西方19世纪末“神思新宗”（尽管奉为主要参照），而是紧紧抓住在中西古今“迫拶”中无路可走的“近世人心”，进行现实的逼问。

其次，主张一切文化，根柢在“自性”、“自心”，余皆“末”与“荣华”，因此文化的危机本质上是“心”的危机，是“本根剥丧，神气旁皇”，“心夺于人，信不繇己”。

复次，文化改造，根本须是“心”的改造，改造的策略，须是立足于“己心”，扩大“内部生活”，这样才能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，“储能于初，始长久耳”。

最后，确立“心声”——文学（“诗”）——为一生事业之本，“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，最有力莫如心声”，“心声”（广义的诗）为一国家一文化之根本所系。

鲁迅的“心学”和他的“文学”一同开始，“心学”就是“文学”。

这四者，层层递进，自成体系。

显然，此一体系并不到“立人”为止。人之为人，贵在有“心”。“立人”，必须先立其人之“心”，否则立无所立。

鲁迅的“立人”思想，一向认为来自西方话语背景，然而如果着眼于早期著作中“立人”和“立心”之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则似乎更应该考虑其“立人”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渊源。实际上，“立人”、“立心”既是纯正的汉语，也是纯正的中国哲学的概念（特别是宋儒的口头禅）。魏晋时期，“人”即普遍被视为“五行之秀”、“天地之心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），宋儒干脆说“立人”就是“为天地立心”（《张子语录》），这也诚如后人解释的，“天地是没有心的，但人生于其间，人是有心的，人的心也就是天地的心了”。“立人”，在根本上就是“立心”。人生天地间，倘无以自立，就好比天地无心。天地无心，整个世界就失去意义，而这正是青年鲁迅最大的忧患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“寂寞为政，天地闭矣”。天地缘何而闭？因为“华国”之子孙“本根剥丧，神气旁皇”，“心夺于人，信不繇己”，其所生存的两间“恶声”四溢，一片“扰攘”。处在这样的时代，诗人何为？哲士何为？当然是要“为天地立心”了。

鲁迅所谓“心”，已非古人所知所感之“心”，而是近世中国之“心”；“天地”亦非古人所知所感之天与地，而是鲁迅生存于其中的近代中国“海涛外薄，黄神徙倚”的“扰攘之世”。不过，就思维框架与向往的境界来说，鲁迅的心与往圣先哲的心是相通的。

倘说鲁迅有他的“人学”，首先应该是一种“心学”，而有别于一般所谓“人学”。

归国以后，“心学”用语的庞杂现象很快消失，集中于“心”、“人心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灵魂”四词。最常用的还是“心”字。有趣的是，他用“心”字代

替留日期间众多同类字眼的同时，又避免其他单字与“心”连缀，而尽量让孤立的“心”单字成词，情愿整句构型迁就这个单字，也不让这个单字经过变形——比如和另一个单字组成双声词——来迁就整句。如此宁拗而勿顺，在语言进化中似乎故意保留一个刺目的非进化或反进化的存在，除了欲彰显“心”字的特殊分量，还能有什么别的意图呢？

2. 中西语言接触之际的双重误读

1898年底，江南水师学堂新生、十七岁的鲁迅专程回乡参加科举考试（县试），这件事足以说明当时一个“稍稍耳新学之语”的青年学子和传统学术有着怎样的联系。姑且不去深究县试考生应该在哪些范围作准备，但可以肯定，由子思、孟子开始，中经韩愈，直到大程、陆、王的一套“心学”，都与“举业”有关，不该陌生罢。鲁迅说他“几乎读过十三经”（《华盖集·十四年的“读经”》），“十三经”中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向来就被视为宋明心学的源头。此外，他熟悉的《诗经》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庄子、《尚书》的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以及老子的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，也都位列心学谱系之首。讲“人为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”的